恆常性與歷史性

日本江戶時代《春秋》、《左傳》學的詮釋實踐與方法

宋惠如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題名/著者: 恆常性與歷史性：日本江戶時代《春秋》、《左傳》學的詮釋實踐與方法 / 宋惠如著
版本: 初版
出版: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2026.11
識別碼: ISBN 978-626-7615-41-6 (平裝) | CIP 115015412
主題詞: LCSTT: 春秋(經書) | LCSTT: 左傳 | LCSTT: 經學 | LCSTT: 研究考訂 | LCSTT: 江戶時代 | LCSTT: 日本
分類號: 621.7

恆常性與歷史性：日本江戶時代《春秋》、《左傳》學的詮釋實踐與方法

作　　者｜宋惠如

發 行 人　李蔡彥
發 行 所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總 編 輯　廖棟樑
執行編輯　林淑禎
校　　對　吳浩宇
地　　址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82375669
傳　　真　886-2-82375663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8號7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郵撥帳號　19246890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初版一刷　2026年11月
定　　價　580元
I S B N　9786267615416
G P N　1011501380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次

序一　連清吉　i

序二　楊晉龍　v

導　言　近現代以來《春秋》學研究的歷史脈絡與當代意義　1

上篇　嚴格的原典主義

第一章　龜井南冥的《春秋》學　21

第一節　《春秋左傳考義》：原典主義與古文辭詮釋　21

第二節　龜井南冥《春秋》學主張：釋「孔子作《春秋》」　42

第二章　龜井南冥與龜井昭陽《春秋》、《左傳》學的經解體系及其實踐　63

第一節　龜井南冥《左傳》詮釋的語言意識與方法　63

第二節　龜井昭陽《左傳纘考》：原典主義的深化與方法體系的確立　92

第三節　龜井昭陽解經法：從「謹始」說論「釋經合傳」　118

第四節　龜井昭陽論「文相變」與對《春秋》的過度詮釋　149

第五節　龜井昭陽論《左傳》對《春秋》的評價　168

第三章　龜門《春秋》、《左傳》學的詮釋實踐與意義 185

——— 下篇　歷史性詮釋的開放與轉化 ———

第四章　中井履軒之孔子《春秋》亡佚說與《左傳逢原》經解 193

第五章　帆足萬里《左傳標註》中的上古政治理想與釋經實踐 243

第六章　東條一堂《左傳標識》的釋經實踐與時代意識 273

第七章　安井息軒《左傳輯釋》的詮釋體系與方法 301
第一節　安井息軒的《左傳》詮釋與經學實踐 301
第二節　《左傳輯釋》經解及其方法（一） 331
第三節　《左傳輯釋》經解及其方法（二） 382

第八章　從述作到詮釋——《春秋》作為儒者價值論述的實踐場域 429

參考文獻 439

謝辭 453

序一

連清吉／日本國立長崎大學名譽教授

狩野直喜〈公羊答問〉說：日本於春秋經傳的注釋傳統，重視《左傳》而輕忽《公羊傳》。安井小太郎《經學門徑書目》載錄江戶時代經學注疏書目，以《四書》《左傳》為最多。足見《左傳》注疏是日本經學的顯學。然國內中國學界於日本《左傳》注疏僅留意明治時代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甚少涉及江戶儒者的《左傳》注疏。日本中國學界雖記述江戶時代的《左傳》注疏，然未嘗深入研究。故本書論述「日本江戶時代春秋左傳學研究」，是中日近代中國學界研究日本江戶儒者《左傳》注疏學的先聲。

幕末明治期朱子學者楠本碩水說：「本邦異學之徒有學力者，不若伊藤仁齋父子、物徂徠。龜井昭陽繼起，其經說遠出伊、物之上，但僻處西陬，其學僅行於一方，不廣及天下耳。(《碩水先生遺書》) 意謂龜井昭陽是江戶時代經學的第一人。西村天囚《異彩ある學者》稱：「龜井昭陽為江戶時代經學的巨擘，當時經生，鮮出其右」。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自序》：「近儒之注左氏者，予所涉獵在皇朝則中井氏積德、增島氏固、太田氏元貞、古賀氏煜、龜井氏昱、安井氏衡、海保氏元備，皆有定說，而龜井氏最詳」。即參酌中井履軒《左傳逢原》、大田錦城《左傳標註》、古賀侗庵《左傳探頤》、龜井昭陽《左傳纘考》、海保漁村《左傳集注》的著述。所謂「龜井氏最詳」，岡村繁稱竹添光鴻祖述龜井昭陽《左傳纘考》。(《左傳纘考》解說)。綜輯諸說，本書以龜井昭陽為中心而論述「日本江戶時代《春秋》、《左傳》學研究」，掌握江戶《左傳》注疏史的精要關鍵。

龜井南冥《春秋左傳考義》，在方法上，在全然信任經傳文字的解經意識下，肯定《左傳》文字、文辭、文句、文意，以至於行文整體之氣，深入其語言結構，檢證《春秋》《左傳》為有精心謹密之作。龜井昭陽《左傳纘考》繼承其父南冥治經原則，尤其有意識的將治理之法，分為五十二項論解經（三十八項）、釋傳之法（十四項），說明詮釋《春秋》經傳文史、義例書法時的細部問題。其深入《春秋》《左傳》之經傳結構，說明《春秋》書法，排除因《三傳》義例之說，而過度詮釋《春秋》文辭所形成的異化與差失。

龜井昭陽強調《左傳》為同修俱作，專據《左傳》釋《春秋》，此一解經前提具有詮釋上的特殊效用。將詮釋《春秋》限於《左傳》，又《左傳》限於《左傳》自身繁多文字之中，亦當限於《春秋》的訊息結構中。這是一種語境的限制，避免語言文字歧義性與時代漸次隔絕所形成的語義斷裂，所形成的意義的廣泛化時的設想。換言之，此一語境上的彼此限定，使得以古語訓釋古義，至少存在者《春秋》以《左傳》為參照，《左傳》以《春秋》為參照，得以更為完整的設下解讀釋義的基礎。

中井履軒是江戶時代大阪懷德堂的儒者，懷德堂的學問以朱子學的探究為傳承，中井履軒別出蹊徑，沈潛經傳，著述《七經雕題》。內藤湖南〈（中井）履軒學の影響〉說：中井履軒是江戶時代開創「新學的先驅」，於江戶儒學的地位猶如顧炎武在清朝考證學的地位，皆有啟蒙影響的學術成就。於《左傳》注疏，東條一堂《左傳標識》類似於中井履軒《左傳雕題》；帆足萬里受中井履軒的影響，著述《左傳標註》；安井息軒《左傳輯釋》於《左傳雕題》亦多引述。換言之，中井履軒《左傳雕題》是江戶時代注疏的先驅，本書論述中井履軒、帆足萬里、東條一堂、安井息軒等人的《左傳》注疏，辨彰江戶《左傳》注疏學的傳承淵源。

中井履軒先作《左傳雕題》，後簡錄為《左傳雕題略》，晚年集成《左傳逢原》，後者面目已大異於前；在前期參考明儒注解，至《左傳逢原》則多削去相關註記，然則基本解釋《左傳》的立場與經解更動不多。中井履軒《春秋》學觀，不僅繼承朱子對於《春秋》的基本判斷，甚至強化了朱子未曾明言的孔子與傳世《春秋》的質疑，形成分別孔子《春秋》與今

傳世《春秋》不同的論斷，其以孔子《春秋》亡於秦火，而以今《春秋》非孔子《春秋》。在否定傳世《春秋》學的基礎上，中井履軒得以建構其理想中的孔子《春秋》，也因而多不認同《左傳》解經釋今傳世《春秋》價值，其疏解《左傳》承朱子重視史文述事，亦趨向清儒透過詳考名物地理之實，糾補杜預注解之失。

帆足萬里《左傳標註》，在治經的基本立場上，接受古文辭學派對於上古治世、先王之道的治世理想，並將之視為孔子之學的理想，然其經典注疏的實質，仍依從中井履軒的治學視角，質疑傳世《春秋》與《左傳》及相關疏解的價值。其《春秋》學觀主要有二：一、今傳世《春秋》，偽為孔子《春秋》，實質上乃為「魯春秋」；二、不僅據孟子說論孔子《春秋》，更強調當自孔子話語的《論語》，論理想的孔子《春秋》。帆足萬里主要結合《論語》正名之義，主張東周君臣不相安，是以嚴分君臣、正名乃為必要。在疏解《左傳》方法上，融合古文辭學以古義論經的方式，同樣透過解釋字義，斷辭立論，如〈書西崦先生餘稿後〉所論：「其經解汎取古今眾說，一斷以文辭，糺繆斥非，闡發幽頤，瞭如覩火」。

東條一堂《左傳標識》，主要校正杜預解釋之誤區，補充杜說之不足，並列舉其他先賢的注解與自說相合之處。其《春秋》觀部分承接中井履軒《左傳》不解經的立場，不全然信經、釋傳，然亦多處引用杜《注》孔《疏》解釋《左傳》。他也傾向認同《左傳》述韓宣子讚賞「魯春秋」為周之所以王之表徵，高度評價「魯春秋」，推舉此中呈顯的先王之道。從方法上來看，東條一堂疏釋經傳，注重聲音、文字、訓詁與典章制度，具有清學考據風格，受容於中國明清學者《春秋》《左傳》學頗多。在內容上，對「使亂臣賊子懼」此一孟子所言《春秋》學命題有著特殊關注，於經傳注解中也對焦循論篡弒之亂中的亂臣賊子亦多有引論，長篇的探討《春秋》天文曆法，亦深論《左傳》所及民生之井田制，為其於西洋曆法、新學與經典實踐性的關注。

安井息軒《左傳輯釋》，主要關切制度、禮樂與政刑法律等議題，如同其研究《管子》，對二書的探研，可視為其對先王之治、三代制度內容的研究與實察。其治經理念紹述徂徠學，《春秋》學觀同於龜井氏父子

者，以《左傳》為孔子、左氏共修，以及專據《左傳》詮釋《春秋》，不同於龜井氏者亦有二點，第一、在治經方法上，不同於龜井氏父子，廣取歷代古義疏解成果，詮釋經傳。第二，不同於龜井昭陽關注《春秋》經傳書法的歸納、實證，安井息軒更著重《春秋》經傳作為史記之本質，是以就傳統所論屬辭比事之法，尤重比事法中，《左傳》「序事」之效，以之為不遜於書法凡例、或更有超其之上的積極解釋效力，以《左傳》史文述事之本色與特質，充分開展其解經上的優勢，安井氏此見，為《左傳》釋經系統中，重大的創見。

本書明晰龜井昭陽為江戶《左傳》注疏巨擘的所在，上溯中井履軒，下探帆足萬里、東條一堂、安井息軒等人的《左傳》注疏，釐清中井履軒至安井息軒的注疏脈絡，究明承續關鍵的論點。若命題「江戶《左傳》注疏史」，則中井履軒是先驅，龜井昭陽為巨擘，帆足萬里、東條一堂為扶翼，安井息軒為大成。

十數年來，於東亞漢學研究的國際會議，結識宋惠如女史。深知其為人溫柔敦厚，潛研日本江戶時代的《左傳》注釋，探究江戶中後期徂徠學派、復古學派、折衷學派以及古注學派的《左傳》注疏的內涵，別出心裁，頗多發前人所未發者的論說，炳蔚成章，裨益斯學。

連清吉

序二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兼任研究員

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經由被動引入或主動輸出的傳播方式，進入其他的文化地區，從而被接受影響並產生作用，進而形成現代人所稱的「儒家文化圈」，日本即是此「儒家文化圈」特別重要的一環。此書即以日本江戶時期（1603-1848）的龜井南冥（1743-1814）、龜井昭陽（1773-1836）父子，以及中井履軒（1732-1817）、帆足萬里（1778-1852）、東條一堂（1778-1857）與安井息軒（1799-1876）等學者，涉及《春秋》學與《左傳》學的著作為對象，考察分析這些江戶學者對《春秋》與《左傳》的理解及其詮釋之際形成的經史觀、歷史意識與解經方法，並比較龜井父子與其他學者對《春秋》與《左傳》在認知、詮釋、分析上的主張、收穫與差別。惠如透過既存文獻文本內涵的深入挖掘，證實前述江戶學者排除《三傳》兼釋而以《左傳》為中心的理解思路，以及超越杜預（222-285）注解傳統的《春秋》解經方法等的研究表現。研究成果有助於對日本江戶時期學者，涉及《春秋》的認知、詮釋與方法等的深入了解，進而揭示江戶時期學者有別於中國學者的獨特詮釋發展的模式。同時經由對日本江戶時期《春秋》學和中國《春秋》學研究模式的對比性了解，不僅有助於對東亞經學多元發展的認知，同時還能夠由此而觀察到經典在異文化的學術環境，如何被理解、重構與運用的實際樣態。

筆者的學術專業，除「治學方法」和「四庫學」外，主要固然是在經學研究，但研究的主要對象，多數集中在《詩經》、《禮記》、《論語》和《孟子》，偶而也觸及《尚書》，雖然我的博論指導恩師張以仁教授（1930-

2009）常常教導我涉及《春秋》學的研究成果，張老師的《春秋史論集》也曾乖乖看過。我的學長張高評教授和李隆獻教授，還有學妹張素卿教授等，更是《春秋》學的研究大家，他們的大作我也曾乖乖地讀過一些，但最後還是如同對《周易》的研究了解那樣，亦即除一般經學史的基本認知外，並無法能有較為學術專業性的深入理解。不過因為曾閱讀《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說，因而發現「屬辭比事」指涉的是「其為人也」，並不是「其為文也」；同時「屬辭比事」是《春秋》教而非《左傳》教。於是想到《春秋》的教化功能，當是要讓受教者的為人可以表現出「屬辭比事」的能力或樣態，並不是為文的能力或樣態。後代許多學者直接以《左傳》取代《春秋》，變成「屬辭比事，《左傳》教也」，基於學術研究詮釋自由的基本權力，學者要如此說當然並無不可。然而若要確立「屬辭比事，《左傳》教也」之說可以成立，首先必需要確定《左傳》的編作者，確實是依循《春秋》教導形成的「屬辭比事」教化要求而編寫《左傳》，如此即可認定《左傳》實際呈現了「屬辭比事」的內涵，亦即《左傳》純粹是在《春秋》之教制約下編寫而成；其次是如何將指涉「人」品行的「《春秋》教」轉變成指涉「文」敘事的「《左傳》教」？可惜的是這個「先期的假設」或「探討的先見」，就現存文獻加以觀察，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讀者固然可以如此認定，但也可以不如此認為，可知「認定」和「否定」都是屬於「自由心證」，兩者具備同等的地位與話語權的效力，但許多研究《左傳》的學者，似乎從來沒有把《禮記・經解》這段文字的內涵當作一回事，這使得我對現代《春秋》學研究，尤其《左傳》學的研究，出現頗多難以理解疑惑之處。

《春秋》學的研究者，當然斷不可能忘記《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一句重要的宣示。當年讀到這句話，由於已經讀過史官世家子弟司馬遷（145-87 ？ B.C.）《史記・太史公自序》所稱「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歷史記載，同時又想到孔子在春秋時代固然是「名人」，固然有許多在政治界活耀的弟子門人，然而孔子和弟子既不是握有終極政治權力的人，更不是官方書寫歷史著作的史官，如何能夠讓那類所謂「亂臣賊子」確實地把孔子的「《春秋》筆法」當一回

事而產生「懼」呢？亦即孔子和孔門弟子們並沒有操控當時輿論的能力，也沒有操控史官書寫史書的權力，如何可能造成後代定義的所謂「亂臣賊子懼」的效果呢？當時曾想「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拒」的意思呢？「亂臣賊子拒」說的是這類「亂臣賊子」，根本不屑把孔子的話當一回事，因而拒絕接受《春秋》高舉的政治倫理內涵。是不是孟子（372-289B.C.）將這類不屑而不當一回事的「拒絕」，直接等同於因為「懼怕」而「不敢接受」，亦即將「拒絕接受」直接等同於「害怕退縮」呢？所以會有如此猜測的緣故，主要是觀察到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盡心下》），那種「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對待歷史記載取捨的態度而來。因為從這段文獻，可知孟子對待歷史主要是以自己主觀的「先見」（Prejudices）做為論述判斷的根據，孟子固然不會捏造歷史，但對歷史所下的判斷，顯然主觀的詮解想像多於事實的陳述，並非全然可靠故也。亦即筆者以為孟子此說，很可能並非根據觀察歷史事實的實際陳述，僅僅只是孟子依據自己的認知，更進一步發揮孔子寫作理想期望的價值描述而已。

從「治學方法」的角度來說，面對研究文獻，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至少有「誰在說」（作者）、「說甚麼」（內容）、「為何說」（目的）、「給誰聽」（預設讀者）、「誰要聽」（傳播）、「誰真聽」（接受）、「誰去做」（執行）等七項。依此七項基本思考來看，孔子寫作《春秋》可能的「目的」與「預設讀者」，若是借用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的「理想型」（Idealtypus）概念進行分析，大致可以有三種可能：一是批判歷史事件，主要是寫給自己看，表達自己的感慨與心情。二是教育引導學子，主要是寫給學生看，做為近代史課程的教科書。三是傳達政治理論，主要是寫給包括統治階層在內的天下人看，期望改變天下的政治局勢。就是說孔子寫作《春秋》是表達自己主觀的歷史批判？還是想要透過「以史為鑑」而達成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等教化的功能？還是「借史立說」用以傳播自己建構的政治統治理念？不過自從學界認同「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個政治性的「詮釋性」（Interpretive approach）的解釋之後，第三種可能於是成為後人認知孔子寫作《春秋》的唯一共識性

答案，其他兩種可能性從此被束之高閣，即使有少數人注意，也會在唯一共識「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的作用下，不知不覺的失去繼續探討分析的研究意願。筆者還依照前述七項基本思考，認為還可以有一個相當重要，但從來受到關注的基本問題：就是可以問孔子到底是為了政治統治者的「政府」利益而寫作《春秋》？還是為了被統治者「人民」的基本權益而寫《春秋》？

孔子寫作《春秋》的背景，就今日一般性的普遍認知而論，大致是政治上「分裂割據」，導致周天子失去應有的身分與地位；社會上「禮壞樂崩」，導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面對這種不符合自己理想的混亂世界的局勢，自然會有自己的主觀感慨，自然有可能寫成近代史教科書引導學生認知歷史，同樣也有可能想要改正當下這個他認定為混亂崩解的政治與社會局勢，回歸到自己認同且嚮往的理想舊秩序。若排除前兩種寫作可能，僅從第三種可能加以分析，就可以認定孔子所以會寫作《春秋》，主要是看到自己認同崇仰的舊秩序嚴重崩毀，處在這個政治與社會舊秩序崩解背景的影響前提下，孔子寫作《春秋》希望達到的目的，自然是要重新喚醒諸侯國原初尊崇周天子的政治基本規則，使得政治和平、社會安定，恢復孔子心目中的理想舊秩序。依此政治性思路，從而可知孔子寫作《春秋》的主要目的乃是在「安內」，實質性的要求就是達成並保持周天子「一統天下」而受天下諸侯尊崇的原初身分與地位，因而回歸到周初國家統治安寧、社會生活安定的理想環境。孔子並沒有武力支持，從而可知《春秋》「亂臣賊子懼」的「安內」，並不是武力的掃蕩征服，僅能是教育的倫理教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各安其分而已。

惠如的這部大作，探討的是異文化學術交流的議題，筆者認為若以異文化學者之學術論著成果為研究對象，用以探討中外文化或中外學術交流的呈現或結果，探討分析之際，需要關注的異文化學者的學術成果，必需重視其著作實際展現的內容，至少需要包括兩大類的內涵：一是來自中國的「中國文化學術因素」；二是中國之外的「原生文化學術因素」。異文化學者著作內的「中國文化學術因素」的內涵，具備了展現中國學術傳播接受的結果與功能的作用；異文化學者著作內的「原生文化學術因素」的內

涵，具備了展現不同文化學術交流發展的反響與功能的作用。這兩大類的文化學術內涵，可以更進一步的細分為六小項的內容，首先就來自中國的「中國文化學術因素」而論，可以細分為「純中國因素的接受抄襲」、「純中國因素的運用開發」和「反中國因素的抵抗拒絕」等三小項。其次就非中國的「原生文化學術因素」而論，可大致區分為「純本土因素的加入」、「結合兩地因素的融合」和「超越兩地因素的創造」等三小項。就深入探討異文化的學術交流的學術成就而言，這六小項都是需要認真探討的基本內涵，更是深入探討異文化學術交流整體表現之際，不容忽視且必需回應的基本內容。

依據前述判斷異文化學術交流的六小項表現指標，觀察惠如大作的研究表現：「接受抄襲」似乎顯得太過理所當然，惠如的大作並沒有在此方面多加著墨。主要的研究重心，大致上是突顯「運用開發」和「抵抗拒絕」的內涵。然而在強調的「運用開發」和「抵抗拒絕」的內涵中，何者是「純本土因素」？何者是「結合兩地因素」？何者是「超越兩地因素」？惠如大作內固然都有部分相涉的研究成果，但並沒有更進一步深入的分析，這部分我覺得是惠如可以繼續發展探討的議題。再者，惠如大作探討的對象，僅是江戶時期的部分學者，行文之際使用「日本」的總體性全稱，似乎並不是很合宜，若是改成限制性的「江戶時期」，或者更為恰適！

惠如在 2008 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前，由於是學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壽安研究員指導的入門弟子，因而經常參與中國文哲研究所的學術活動，即使後來任教於遙遠而交通不便的金門大學，依然保持參與文哲所相關學術活動的優良習慣。認識惠如超過二十年，對惠如用心於研究的學術堅持，非常的感動與敬佩。由於對《春秋》學的研究並非專門，無法提出甚麼高深的學術觀點，僅能將自己對《春秋》學的粗淺見解，提供給惠如斟酌參考，希望可以有助於惠如的未來研究，是為序！

楊晉龍 序於思玫秀影齋

2026 年 9 月 1 日